

# 一张“立功喜报”（上）



五一黄金周过后第二天，在揭西工作的侄儿曙东带我到家乡走了一趟。这是我第二次到家乡。第一次是1994年的“冬节”的前一天，那一次仅是路过而已。当时，《汕头特区报》改版不久，邀请羊城晚报的老编、老记去交流经验；我是最后去的一位，经验交流会结束时，特区报时事部的编辑知道我的老家在潮安金砂乡，说在送我去机场时，车子可绕道去潮安，带我到家乡看看。

回家乡是我多年的夙愿。幼年时，祖父常跟我们讲家乡的故事、风土人情、物产。祖父讲家乡“砂陇黄”的由来——四百多年前，始祖遂隐公因避战乱从福建莆田迁来潮州，与同乡曾公、陈公、蔡公结拜桃园，在潮州金砂乡建寨，先祖们训示子孙后代永结同心，共忧患、同欢乐，和睦相处；四姓子民各居乡里一方，黄姓是社首，居于寨西，悬“江夏世家”匾，此处便是故乡“砂陇黄”。祖父接着讲老祖先留下的旧宅“口

门楼”和“口门楼”门前的大榕树；还有池塘边打谷场上的狮头鹅，等等。祖父讲完后，意味深长地对孙子们说：“人不可忘本，人若忘本，不知其可。忘了自己的家乡、忘了祖国，就是最大的忘本！你们是‘砂陇黄’的‘仔弟’（子孙），长大后一定要去家乡看看！”。

在我那幼小的心灵中，家乡是那么的亲切，又是那样的陌生。回国几十年，八年的军旅生涯，三十几年的新闻工作，大部分时间都在北方度过；我从未回过家乡。特区报同仁这一善解人意的建议，我当然是感激不尽的。但那一次，由于时间短促，司机对“砂陇黄”的路径不熟，走了不少冤枉路，才找到了“金砂乡黄厝”。陪同的《汕头特区报》编辑认识“黄厝”的部队作家雷铎的家，他叫司机把车子停在雷铎的家门口，下车打听“口门楼”在那里，正好碰上雷铎的母亲；一问，原来“口门楼”就在她家前面十几米

的地方。司机把车开到了“口门楼”。这里既无楼房，也无牌楼，所谓“口门楼”，只是几处连在一起的小院落。我急匆匆地进入“口门楼”，这是我第一次踏入“老家”的门槛！心情之激动，实非笔墨所能形容。

我在家乡已无直系亲人，只有一位远房堂弟勇高在“口门楼”住。进了“口门楼”，问了一位“乡里亲”，答道：“勇高家里没人，他出外做‘生理仔’（潮州话“小卖买”），午后才能回来，勇高嫂也刚刚出门，到邻村串亲戚去了。”这位“乡里亲”知道我是“口门楼”的后人，又是从“番畔”回来的，非常热情地请我到 he 家里“歇脚”、喝茶，等候勇高嫂回来。我以赶飞机为由婉言谢绝，但希望能看看祖先的故居。他便带我到勇高的家里去，这是一处四间房子，附带有天井、厨房的小院落。大门没有上锁，“乡里亲”推门而入，带我看了那几间老祖宗住过的房子，又在天井、厨房转了一圈。天井的长条石板上摆着一只大卤鹅、一块煮熟的五花肉、一条蒸好的鲩鱼，还有一盘水果。我才意识到，明天就是“冬节”，家家户户都备好“拜老爷”的供品，勇高家当然不例外。过后，我同这位“乡里亲”在“口门楼”前照了相。那

次回家乡，前后呆了不到半个钟头，急匆匆地离开魂牵梦萦的家乡赶飞机去了。

这一次是有备而来的。头一天晚上，侄儿曙东给勇高打了电话，问好了到“金砂乡黄厝”的最佳行车路线。第二天清晨，用过了早点就从揭西出发，预定上午10时左右到家乡。无奈曙东只到过一次金砂乡，他那年到家乡，“新潮汕公路”还没修通；如今，新公路建成通车了，他入地生疏，到了潮安县城庵埠，车子在城里兜来兜去，找不到新的潮汕公路入口处。此时已近中午，只好就近雇了一辆“三轮摩托”引路。我们的车子跟随着“三轮摩托”驶入“新潮汕公路”，宽阔的公路右侧高悬着的路牌标明：此处离“金砂乡三村”（即黄厝）为8公里。车子很快就到了“金砂乡三村”路口，堂弟勇高已在那里焦急地等候我们。

我和勇高是第一次见面，寒暄几句之后，我们便一起上车。勇高没有带我们去“口门楼”旧宅，而是要我们把车子开到他的新居去。车子在靠近公路不远的一处独门独户的三层半的小洋楼前停下。下车后，我正在打量他的新宅时，勇高仿佛看出我的心思，慌忙解释道：“这座楼是我女婿建的，我搬来同他们一起住。”刚坐下来，勇高弟媳便端来了莲子薏米汤，这是家乡人款待远方亲人的首道点心。莲子薏米汤很甜，我象征性地喝了一口，以示谢意；我有糖尿病，不敢喝第二口。之后，勇高夫妇带我去“口门楼”旧宅“巡巡”（参观）。他说，自从他们搬入新居后，“口门楼”那几间房子，便租给打工仔当宿舍。进了大院，正好一群江西来的打工仔、打工妹围着天井的大长条石板吃饭；他们见屋主带着客人来参观，显出诧异的神态。



这是1953年春节前夕送到家乡的“立功喜报”，在堂弟勇高家里保存了50多年，我2005年回家乡时，物归原主。